

张謇的慈善思想研究

孙艳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江苏南通 226011)

摘要:张謇的慈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思想根源具有显著的时代烙印,融汇古今中外,同时兼具个人性格特征,兼容并蓄。弱化对救助对象的道德评判,体现了张謇博爱的慈善理念,同时也表明慈善已内化为其人生态理想的一部分。张謇在慈善方式上推崇教养并重,并将慈善的价值融入民族精神。张謇慈善思想的精髓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和促进当代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张謇;慈善思想;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640(2016)11-0005-02

1912年,张謇创办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并亲自题写校训“祈通中西,以宏慈善”,医院不仅在沟通中西医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还经常减免贫病患者的医疗费用,普及卫生防疫知识等。然而,南通医学专门学校仅是张謇创办的诸多地方慈善事业的一个缩影,其在南通创办的慈善机构还有如育婴堂、养老院、栖流所、贫民工场、盲哑学校、济良所等,广泛覆盖了当时社会的贫困阶层,张謇也因此被誉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先驱。学术界关于其慈善思想和活动虽有一定论述,如朱英《论张謇的慈善公益思想与活动》、高鹏程《论南通张謇的慈善事业》等,但并未对张謇慈善思想中的特质进行深入阐述,笔者认为,张謇慈善思想的特质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

一、思想根源:兼容并蓄

张謇所处的时代是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其慈善思想一方面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融汇古今中外,同时兼具其个人性格特征,兼容并蓄。

张謇是近代儒商的典型代表,儒家思想是其众多实践活动的思想根源。张謇曾说“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使他摆脱困苦。”^{[1](P286)}

此外,由于佛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普通百姓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张謇崇尚务实,善于利用佛教中的慈善理念和积极因素,宣传慈善事业。在《南通新育婴堂募捐启》中,他说“各随愿力,共切勤勤,并恳仁言转相劝募,庶几出五百道乳,等于佛母之慈悲,广七级浮屠,无量救人之功德”^{[2](P105)}。张謇认为,佛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社会秩序失范和道德衰败起到缓解作用,弥补法制的不足,即“故释氏者言,可以辅今日圣道国法之穷,使人由祸福趋避之念,去不善而即于善,以入

觉路而证正果,其诱掖裁成之功,为不可思议尔。”^{[3](P540)}

传统社会的劝善书籍往往将行善与果报紧密联系在一起,如著名的劝善书《太上感应篇》开宗明义地写道:“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其他如“积善余庆、积恶余殃”“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等传统慈善观念是促使人们从事慈善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张謇处于新旧时代交替时期,他对传统慈善思想并未全盘吸收,而是有所扬弃,他在第三养老院开幕演讲时说:“夫养老,慈善事也,迷信者谓积阴功,沾名者谓博虚誉。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安心一点。”^{[4](P508)}

除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外,张謇还借鉴吸收了近代西方的慈善理念。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之一,西方教会在此经营的慈善机构也较集中。据相关资料显示:“张謇在清末民初就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教会在华东地区创办慈善机构的一些情况,还亲自参观了上海教会的慈善机构,并深有感触。”^{[5](P216)}他在参观徐家汇圣母院育婴事业后,说道“复与同人力去普通育婴堂腐败之陋习,参用徐汇教会育婴之良法,开办一载,活婴千余。”^{[2](P105)}此外,张謇在南通创办的盲哑学校也受到了西方慈善思想的影响,他曾记述:“法兰西人于十八世纪始,创凸字以教育人,其后传衍于巴黎盲学校乃寝广,西班牙人又创记号法,至德意志人创发语法,始详于教哑,乃有聋哑学校。”^{[4](P531)}

总之,张謇的慈善活动思想融通了古今中外,可谓博采众长,兼容并蓄。他曾在《谢参观南通者之启事》中写道:“有所法,法古,法今,法中国,法外国;亦不必古,不必今,不必中国,不必外国。察地方之所宜,度吾兄弟思虑之所及,财力之所能,以达吾行义之所安。”^{[1](P198)}

二、慈善对象:弱化道德评判

传统社会的慈善救助对象往往带有道德评判,某些

收稿日期:2016-11-02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指导项目“地方名人资源在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中的运用——以南通张謇为例”(项目编号:2014SJD653)。

作者简介:孙艳(1983—),女,安徽芜湖人,江苏商贸职业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教育学、社会学研究。

特定人群被贴上道德低下的标签,得不到应有的救助。如清初的一些普济堂明文不收游手好闲之人,就是说贱民之属,及不符合主流道德规范的人,不能受到善堂的惠泽^{[6] (P58)}。一些救济寡妇的清洁堂也明文规定,只收清白之家的寡妇,甚至只收儒生之寡妇,曾为娼妓者及奴婢者一概不收,再嫁者则被逐出^{[7] (P339)}。浙江嘉善的同善会对受惠人资格这样规定:“善款得优先发给孝子、节妇等有德行而贫困之人,然后为政府的养济院不收但又不愿沦为乞丐之贫病老人(即不作恶的贫人);善会明文规定不救济的是‘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少强壮、游手游食以致赤贫者’,一律不予救助。”此外,还举出了四种“宜助而不助”的对象:一是衙门中人,因为这些人年轻时不劳而获,年老时如贫困,只是“稍偿其孽”;二是僧道,因为他们不耕而食,而且可自行广募;三是屠户,他们以屠宰为业,害命无算,“仁心必短”;四是败家子,他们游手好闲,败坏风俗^{[6] (P56)}。

相比而言,张謇的慈善救助理念中明显弱化了对救助对象的道德评判。他认为“城市贫贱女子不耕不织,有可资生之所而又不习焉,岂其天性之果趋下乎?天之生人必不如是,且固不限于城市贫贱女子也。”^{[4] (P347)}因此,在张謇的观念中,不论是城市贫贱女子还是游手好闲之人,甚至沦为乞丐、妓女并非是其本性,而是为生活所迫。1914年,张謇利用通州城内原有的税务署旧址,并收购部分民房,改建为“南通济良所”,这是一种专门为不良妇女和娼妓而设的收容机构,张謇通过主动救助而非漠视这一群体来改良社会风俗。甚至对于流浪狗,张謇也予以收容,“是犹诛不教之民也,不如别牝牡栏之,姑减其孳乳”,于是,在城南郊和西南郊设栏,“遮藩加树,募糠秕碎米,时冬夏日一再伺”^{[8] (P10)}。

对慈善救助对象道德评判的弱化,一方面体现了张謇博爱的慈善理念;另一方面也表明其慈善理念跨越同情怜悯的浅表层次,已深刻内化为其人生理想的一部分,即“慈善虽与实业、教育有别,然人道之存在此,人格之成在此,亦不可不加以意。”^{[9] (P1537)}

三、慈善方式:教养并重

传统善会善堂多重养轻教,近代以后,教育在慈善活动中的作用逐渐被人们重视。张謇十分重视教育和慈善,曾说:“属于积极之充实者,最要为教育;属于消极之救济者,最要为慈善。教育发展,则能率于以增进;慈善周遍,则缺憾于以弥补。”^{[4] (P355)}

“欲救其弊,惟有兴学。兴学之本,惟有师范。”^{[2] (P107)}因此,张謇创办师范学校,为平民提供教育机会,也为慈善事业培养人才。此外,他还将教育融入慈善事业之中,倡导教养兼施,他在狼山盲哑学校开幕会演说中称:“盲哑学校者,慈善教育之事业……盲哑学校者,期以心思手足之有用,弥补目与口之无用,其始待人而教,其归所不待人而自养,故期校,始在收教育之效,而终在收慈善之效。”^{[4] (P330)}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张謇还注重对救助对象生活技能的传授,他设立贫民工场,传授贫民子弟手艺,使他们日后能够生活自立。除教养并重外,张謇推崇以工代赈,“水道不修,则水灾尤必有之事,有灾即又须赈。徒赈无益,甚且养成一般人民之依赖性,故以工代赈,为中国向来办赈至善善策。”^{[4] (P197)}

四、慈善价值:融入民族精神

首先,近代以来,中国天人祸不断,在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冲击和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慈善作为一项济世利民的事业被赋予了更多民族精神。张謇的慈善理念具有浓厚的民族自强精神,他认为“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惟赖慈善。”^{[10] (P430)}

其次,慈善是体现民族自尊的一个重要方面。面对灾害救济,张謇主张应依靠国人自身的力量,这不仅事关国体,更是凝聚民心的一个重要举措,“虽曰救灾恤邻,谊所应有,然外国赈灾不肯轻受其与国之帑,非第以存国体,亦所以固民心”^{[10] (P126)}。

最后,慈善事业还能增强民族自信心。张謇在《谢教育慈善募捐启》中这样描述:“自投身实业以来,举所岁得,兄弟次(第)经营教育、慈善、地方自治公益事业,凡所当为者,自无至有,自塞至通,自少至多,自小至大。既任建设以谋始,复筹基本以虑终。”^{[2] (P197)}

五、结语

从古至今,慈善事业一直与社会文明相伴共生。党的十八大以来,“友善”作为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被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慈善思想是慈善事业的集中体现,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习近平曾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11]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在刚刚结束的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上,习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张謇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先驱,开近代中国风气之先,因此,汲取张謇慈善思想的精髓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和促进当代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刘厚生. 张謇传记[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5.
- [2] 李明勋, 尤世玮. 张謇全集: 第五卷[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2.
- [3] 李明勋, 尤世玮. 张謇全集: 第六卷[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2.
- [4] 李明勋, 尤世玮. 张謇全集: 第四卷[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2.
- [5] 周秋光. 中国慈善简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6] 梁其姿. 施善与教化: 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 [7] 夫马进. 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8] 范铠. 南通县图志: 第10卷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53)[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 [9] 李明勋, 尤世玮. 张謇全集: 第三卷[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2.
- [10] 李明勋, 尤世玮. 张謇全集: 第一卷[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2.
- [11] 习近平.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J]. 中国高等教育, 2014, (10): 4-7.

(责任编辑: 陆水东)